

南京出土六朝时期墓志特征浅析

Features of the Six Dynasties-Period Tomb Inscriptions Excavated in Nanjing

白宁

Bai Ning

故宫博物院
The Palace Museum

Journal of Gugong Studies 2016 Vol.17

故宫学刊

二〇一六年 总第十七辑

故宫出版社 | The Forbidden City Publishing House

南京出土六朝时期墓志特征浅析*

Features of the Six Dynasties-Period Tomb Inscriptions Excavated in Nanjing

白宁

Bai Ning

内容提要：

南京作为六朝故都，出土六朝贵族墓志不少，从这些墓志的内容、形制、文体、书体等特征分析可以看出，存在内容从简单至基本完整，形制从多种形制归为一种形制，词句从朴实到华丽，文体从“刻砖（石）为识”到“前志后铭”，书体由隶书到楷书的发展、演变过程。墓志铭完整形制的最终确定，为唐宋以后墓志铭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墓志铭作为一种特有文体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

六朝墓志 内容与形制 文体与书体 特征

ABSTRACT:

Nanjing served as capital for regimes during the Six Dynasties era during the periods from the Three Kingdoms (220–280CE), Jin dynasty (265–420CE), to 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420–589CE). A large number of tomb inscriptions were found in burial sites of the aristocrats. Analysis of these inscriptions in terms of content, formats, literary forms, and calligraphy styles indicates that they underwent a process of evolutionary transformation in various aspects – from primitive simplicity to thoroughness in terms of content, from a diversity of formats to uniformity, from simple, unadorned way of expression towards ornate use of language, from “carving (the inscription) into the brick/stone for the record)” to the fixed pattern of “beginning with record (*zhi*) and ending with epitaph (*ming*)”, and from the use of clerical script to regular script. It was during this period that the complete format of tomb inscription was set, blazing the trail for its further development after the Tang (618-907CE) and the Song (960-1279CE) periods and preparing the ground for such writing to be recognized as a distinctive literary format.

KEYWORDS:

tomb inscriptions of the Six Dynasties era, content and format, literary form and calligraphy style, feature analysis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中国出土墓志整理与研究”（批准号：12&ZD137）系列成果之一，得到国家社科基金专项资助，谨此致谢！

公元3至6世纪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南北征战对峙时期，也是重要的转型变革时期。政权更迭，战争频仍，使得大汉王朝的政治制度、思想体系动摇。中国南方东吴、东晋、宋、齐、梁、陈六个朝代相继在南京建都，稳定了南中国的局势，新的政治环境及经济发展，促进了思想、文化的发展，“华夏正声”得以传承。六朝三百多年的历程是中国历史上承汉启唐的重要历史阶段，六朝墓志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历史变迁和文化繁荣的面貌。

1949年以来，南京市博物馆考古发掘了数百座六朝墓葬，不乏有等级较高的豪门贵族墓葬，出土了大量的文物，为研究六朝历史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资料。处于变革时期的六朝墓志数量虽然不多，但内容翔实，信息丰富，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新中国出土墓志·江苏》[贰]收录了南京市博物馆藏六朝墓志36方，其中东晋墓志25方，刘宋墓志6方，萧梁墓志4方，陈朝墓志1方。这些墓志时间集中于东晋、宋、梁、陈四个朝代，时间最早的是《谢鯤墓志》¹，为东晋泰宁元年（324）。最晚的是《黄法墓志铭》²，为南朝陈太建八年（576）。迄今为止南京地区没有发现东吴和西晋时期的墓志，也没有萧齐的墓志。以南京地区为代表的六朝墓志，包含大量的这一时代的历史、文化信息，本文就南京市博物馆藏墓志内容、形制、文体、书体的特征略作分析，以求方家指正。

表1 南京市博物馆藏六朝墓志简表³

序号	名称	时代	尺寸（厘米）	来源	质地
1	谢鯤墓志	东晋泰宁元年(323)	长60、宽17	南京戚家山M3出土	石
2	温峤墓志	东晋咸和四年(329)	长44、宽43	南京郭家山M9出土	砖
3	王兴之墓志	东晋咸康七年(341)	长28.5、宽37.3	南京象山M1出土	石
4	颜谦夫人刘氏墓志	东晋永和元年(345)	长32、宽14.5	南京老虎山M1出土	砖
5	王兴之夫人宋和之墓志	东晋永和四年(348)	长28.5、宽37.5	南京象山M1出土	石
6	高崧夫人谢氏墓志	东晋永和十二年(356)	长50、宽25	南京仙鹤观M2出土	砖
7	王康之墓志	东晋永和十二年(356)	长50、宽25	南京象山M111出土	砖
8	李缉墓志	东晋升平元年(357)	长31、宽15	南京吕家山M1出土	砖
9	李摹墓志	东晋升平元年(357)	长31、宽15	南京吕家山M3出土	砖
10	李摹夫人武氏墓志	东晋升平元年(357)	长30、宽15	南京吕家山M2出土	砖
11	王闳之墓志	东晋升平元年(357)	长30、宽15	南京象山M5出土	砖
12	王丹虎墓志	东晋升平三年(359)	长48、宽25	南京象山M3出土	砖
13	袁庆墓志	东晋兴宁三年(365)	长32、宽16	征集	砖
14	高崧墓志	东晋泰和元年(366)	长48、宽28	南京仙鹤观M2出土	砖
15	卞氏王夫人墓志	东晋泰和元年(366)	长31、宽7	南京赵士岗出土	砖
16	王叟之墓志	东晋泰和三年(368)	长49、宽24	南京象山M8出土	砖
17	温适之墓志	东晋泰和六年(371)	通高55.2、宽30.4	南京郭家山M12出土	砖(圭形)
18	王建之夫人刘媚子墓志	东晋泰和六年(371)	长25、宽49	南京象山M9出土	砖
19	王建之夫人刘媚子墓志	东晋泰和六年(371)	长25、宽49	南京象山M9出土	石

1 故宫博物院、南京市博物馆：《新中国出土墓志·江苏》[贰]上册，第1页，文物出版社，2014年。

2 故宫博物院、南京市博物馆：《新中国出土墓志·江苏》[贰]上册，第37页，文物出版社，2014年。

3 本表墓志数量较《新中国出土墓志·江苏》[贰]增加5方，系编撰时遗漏者。

续表1

20	王建之墓志	东晋咸安二年(372)	长26、宽46	南京象山M9出土	石
21	李纂墓志	东晋宁康三年(375)	长29、宽14	南京吕家山M2出土	砖
22	李纂夫人何氏墓志	约东晋宁康三年(375)	长29、宽14	南京吕家山M2出土	砖
23	王康之夫人何法登墓志	东晋太元十四年(389)	长48、宽23	南京象山M11出土	砖
24	夏金虎墓志	东晋太元十七年(392)	长51、宽24	南京象山M6出土	砖
25	谢温墓志	东晋义熙二年(406)	长46.4、宽23	南京司家山M5出土	砖
26	谢球墓志	东晋义熙三年(407)	长40.5、宽23	南京司家山M4出土	砖
27	谢球夫人王德光墓志	东晋义熙十二年(416)	长30、宽15	南京司家山M4出土	砖
28	周叔宣母黄夫墓志	南朝初期	长34.4、宽20	南京油坊桥磨盘山南朝早期墓出土	砖
29	蔡冰墓志	南朝初期	长48.5、宽24.8	南京摄山南朝早期墓出土	砖
30	谢琬墓志	宋永初二年(421)	长33.3、宽17	南京司家山M6出土	砖
31	晋恭帝(司马德文)墓碣	宋永初二年(421)	长125、宽30	南京富贵山出土	石
32	宋乞墓志	宋元嘉二年(425)	长33.7、宽16	南京铁心桥出土	砖
33	宋乞夫人丁氏墓志	宋元嘉二年(425)	长33、宽16	南京铁心桥出土	砖
34	宋乞暨夫人丁氏墓志	宋元嘉二年(425)	长33、宽16	南京铁心桥出土	砖
35	明昙喜墓志铭	宋元徽二年(474)	长48、宽65	南京甘家巷出土	石
36	萧融墓志铭	梁天监元年(502)	长59、宽59	南京甘家巷出土	石
37	萧融夫人王纂韶墓志铭	梁天监十三年(514)	长49、宽64	南京甘家巷出土	石
38	卢某墓志铭	梁普通二年(521)	长79、宽99	南京燕子矶出土	石
39	萧子恪墓志铭	梁大通三年(529)	长70.5、宽90.3	南京灵山M2出土	石
40	黄法墓志铭	陈太建八年(576)	长65、宽77	南京西善桥出土	石
41	佚名墓志(仅存“陈、君”字)	南朝晚期	通高61、宽26	南京迈皋桥出土	石

一 六朝墓志的内容

墓志记载墓主人生平梗概，内容有官衔、姓氏、世系宗支、生平事迹、卒葬年月、末尾系以铭辞赞颂¹。墓志内容丰富，有的篇章极富文采，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的佳作。《古文观止》收录了韩愈的《柳子厚墓志铭》、王安石的《泰州海陵县主簿许君墓志铭》²，其价值远远超过记述墓主人生平，表彰赞颂之功能，成为千古传诵的名篇。

墓志的内容有从简单到复杂，文字由少及多的变化过程。文章结构不断完善，内容不断增加，并在客观记述逝者生平同时讲究文字优美，增添了感情色彩，出现了散文化的倾向。南朝以降墓志铭中铭辞颂赞的出现，完善了墓志的内容。

东晋早期志文内容简单，一般只是记述墓主的名讳、郡望、职官、生卒年月、葬期葬地和家庭成员的状况，志文言简意赅。例如《李纂墓志》³，仅有墓主名讳、籍贯、官职、卒葬年月，由 28 字组成两句话的志文，

1 王壮弘、马成名：《六朝墓志检要》序二，第 2 页，上海书画出版社，1985 年。
2 （清）吴乘权、吴调侯：《古文观止》卷八、卷一一，第 349、486 页，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 年。
3 故宫博物院、南京市博物馆：《新中国出土墓志·江苏》〔贰〕上册，第 9 页，文物出版社，2014 年。

结构单纯，文字简练，句句都是关键词，明显起到标识作用。《王兴之墓志》¹前半部分由名讳、籍贯、官职、年龄、卒亡年月、葬日葬地组成个人生平资料，并从埋葬地点引出简单的家族世系宗支状况，后半部分为子女的姓名。志文有生平和世系宗支两个部分。《温峤墓志》²开头述家族世系宗支，接着是个人生平，最后是夫人及子女姓名。内容构架与《王兴之墓志》相同，叙述先后顺序不同。这种由个人生平和家族世系宗支两块组成的内容，是东晋早期志文的特点。

《王建之夫人刘媚子墓（砖）志》³是一方女性墓志，墓主人的生平中既有名讳、年龄、籍贯、卒年葬地和墓主人出嫁时间，还有丈夫的姓名、籍贯、官职，较为详细。在她的家族世系宗支中包括了父亲的官职及子女状况，叙述开始细化。《谢琬墓志》⁴墓主人的世系宗支更为详尽，既有本人祖、父、伯、叔、姑、姊、妹、兄、弟、子等状况，也有其夫人的祖、外祖和父亲的信息，形成一个以谢琬夫妇为中心的庞大的家族体系，全篇有名有姓的达 53 人之多，是六朝墓志中最多的一個，它为研究家族间的地位、婚媾关系提供了重要资料。志文中对于有较高地位的祖父谢奕、叔谢玄等的文字略多，不再是几个关键词，补阙了史料不足。《王建之墓志》⁵在志主生平中记述了官职迁升和履职的情况，这在之前的东晋墓志中尚未见到。由此可见，此时的墓志篇幅开始扩大，文字开始增多，内容有所铺陈，但记述范围依旧是墓主人生平和家族世系宗支两块。

《明昙暕墓志铭》⁶对于生平中墓主人官职升降的叙述较为细致，明氏家族与清河崔氏、平原刘氏家族的婚姻关系表述清楚。特别是文字出现了四字一句的韵文，文中融入感情，在此前墓志中未有所见。志文后出现了专门的四言赞颂铭辞，句式整齐，辞藻华丽，讲究声律，具有很高的文学色彩，这是墓志内容的重大变化，此时的墓志已将转化为墓志铭，在墓志铭文体上有了“质”的飞跃。

试以列表形式分解下列几方墓志内容构成，可以看出东晋墓志至南朝墓志铭的发展变化过程（表 2）。

表2 六朝墓志内容分解表

名称	时代	志文字数	姓名	籍贯	年龄	官职	经历	卒葬	本人宗支	夫人宗支	铭辞
李墓墓志	升平元年(357)	28	李墓，字仲山	广平郡广平县	无	中军参军	无	升平元年十二月廿日丙午	无	无	无
王建之墓志	咸安二年(372)	275	王建之字荣妣	琅耶临沂都乡南仁里	五十五	振威将军、鄱阳太守、都亭侯	本州岛迎西曹不行，袭封都亭侯、州檄主簿、建威参军……鄱阳太守	泰和六年卒，咸安二年葬，与夫人合葬，建康白石	祖、父、子、女、兄弟	无	无
谢琬墓志	永初二年(421)	681	谢琬，字景攻	豫州陈郡阳夏县都乡吉迁里	无	袭东兴侯、改封豫宁县开国伯……海宁太守、散骑常侍	大宋革命，诸国并皆削除……降为柴桑侯。玄复苻坚之难功，封康乐县开国公	永初二年五月卒，七月葬。江宁縣賴乡石泉里	祖父母、父母、伯、叔、姑、姊、妹、弟、子	祖父、外祖父、父	无

1 故宫博物院、南京市博物馆：《新中国出土墓志·江苏》[贰]上册，第 3 页，文物出版社，2014 年。
2 故宫博物院、南京市博物馆：《新中国出土墓志·江苏》[贰]上册，第 2 页，文物出版社，2014 年。
3 故宫博物院、南京市博物馆：《新中国出土墓志·江苏》[贰]上册，第 16、17 页，文物出版社，2014 年。
4 故宫博物院、南京市博物馆：《新中国出土墓志·江苏》[贰]上册，第 26 页，文物出版社，2014 年。
5 故宫博物院、南京市博物馆：《新中国出土墓志·江苏》[贰]上册，第 18 页，文物出版社，2014 年。
6 故宫博物院、南京市博物馆：《新中国出土墓志·江苏》[贰]上册，第 32 页，文物出版社，2014 年。

续表2

明昙懋墓志铭	元徽二年(474)	547	明昙懋字永源	平原鬲人	卅	宁朔将军、员外郎、武原令、员外散骑侍郎	州辟不应，征奉朝请……巨猾滔侵，铎流紫闼。君义裂见危，身介妖嫡	元徽二年五月卒，十一月葬，临沂县式壁山	祖父母、父母、伯叔、兄弟	前夫人父、后夫人父	有
--------	-----------	-----	--------	------	---	---------------------	---------------------------------	---------------------	--------------	-----------	---

六朝墓志内容的发展变化与社会发展的历史大背景不可分割。西晋永嘉南渡，北方士族与百姓为躲避战乱，纷纷举族南迁，流寓江左。东晋元帝“并谓之侨人，皆取旧壤之名，侨立郡县，往往散居，无有土著”¹，以维护华夏正统思想，彰显收复失地决心。反映在东晋初年丧葬制度上的“假葬”，即与此相关。所谓“假葬”，即暂时葬在建康，光复中原后，再归葬祖茔。《谢鲲墓志》就有“假葬建康县石子罡”，“旧墓在荥阳”的记述。因此，东晋早期志文的主要功能为墓葬的“标识”，表明墓主人、原籍、世系宗支关系即可，特殊时期临时安葬，刻石（砖）为识，仅此而已。

东晋咸和六年（331），成帝司马衍在都城建康东吴苑城的基础上，重修建康宫。此时晋朝南都历经24年，南北对峙局面已无法扭转，朝廷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治国安民，稳定大局上，光复中原已不是第一要务。墓志虽承袭了东晋初年刻石（砖）为识传统，但内容开始铺陈，语句顺畅，尽可能地把墓主人职官经历的要点纳入其中，向着“履历表”方向发展。

世家大族在政权中居于高位，他们集名望、财富、人脉于一身，手中有权，影响朝政和社会稳定。东晋政权“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就是大族政治的体现。在社会关系上，士族之间通过姻亲、同宗、故旧等关系编织了一张盘根错节的政治网络，垄断上层社会，保持他们的权势和地位。墓志中记述家族世系宗支的内容是必不可少的，不仅记述男主人的世系宗支，女性家族世系宗支也一应俱全，是当时“门阀制度”在丧葬中的反映。

六朝时期文学的自觉及文人审美的觉醒，文学艺术的繁荣对南朝墓志铭产生了很大影响，墓志铭中出现了专门的铭辞，文字华丽，刻意追求字句的形式美，成为墓志铭不可或缺的部分。四言句深受骈体文的影响，胡适先生《白话文学史》说：“六朝文学，可说是一切文体都受了辞赋的笼罩，都‘骈俪化’了。议论文也成了辞赋体，纪叙文（除了少数史家）也用了骈俪文，抒情诗也用骈偶，纪事与发议论的诗也用骈偶，甚至描写风景的诗也用骈偶，故这个时代可以说是一切韵文与散文的骈偶化的时代。”²墓志铭也不例外。

二 六朝墓志的形制

南京地区六朝时期墓志的形制有一个从多种形制归于一种形制的过程，根据南京市博物馆藏墓志形制，从材质、形状、制作和数量等方面略做分析。

材质：六朝墓志的材质有砖有石。东晋墓志以砖质为多，也见石质，南京市博物馆藏石质东晋墓志占

1 （唐）魏征等：《隋书》卷二四《食货志》，第673页，中华书局，1982年。
2 胡适：《白话文学史》，第7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18%。东晋《谢鲲墓志》、《王兴之墓志》、《王建之墓志》、《王建之夫人刘媚子墓（石）志》等均为石志。南朝亦见砖志，但石志明显增多，南京市博物馆藏石质南朝墓志占57%。南朝早期的《谢琬墓志》、《宋乞墓志》¹，均为砖志。墓志对材质有较高的要求，坚硬、平整、便于刻字，便于完整清晰地展现内容，便于长久保存。

形状：六朝墓志均为长方形，多为长大于宽的竖式长方形，也有宽大于长的横式长方形。墓志尺寸有大小之别，并不统一。东晋竖式长方形墓志一般长在30～50厘米，宽在15～25厘米。南朝墓志一般长在50～80厘米、宽在65～100厘米，石志基本上是宽大于长的横式长方形。

东晋《谢鲲墓志》是长条形状，石材偏窄偏长。正方形仅见于萧梁《萧融墓志铭》²。圆首圭形仅见于东晋《温式之墓志》³。南京迈皋桥南朝晚期墓葬出土了龟趺形制的石质墓志，在墓志中少见。惜风化严重，文字仅存“陈”、“君”二字，余不可考⁴。

制作：六朝墓志形状规整，质地坚硬，字迹清晰，均为专门制作。

石志细腻，表面平滑，做工细致。东晋石志刻字较深，有的做界格。南朝石志刻字较浅，长篇铭文排列整齐，不做界格。东晋的《谢鲲墓志》、《王兴之墓志》、《王兴之夫人宋和之墓志》⁵、《王建之墓志》、《王建之夫人刘媚子墓（砖）志》，南朝《明昙懣墓志铭》、《王纂韶墓志铭》，制作十分精致，为六朝墓志的经典之作。

砖志质地紧致，十分坚硬，大多表面经打磨较为平整，刻字有深有浅，有的有界格、界栏。

《王兴之墓志》、《李缉墓志》⁶，表面曾涂有大漆⁷；《高崧墓志》⁸、《李纂夫人武氏墓志》⁹，出土时有的字迹或界栏里尚存朱砂痕迹¹⁰。存有朱砂痕迹的墓志不止一块，李氏家族的墓志均有，推测刻字前曾用朱砂书写底稿，然后再精细刻凿。

东晋墓志也有粗陋之作，如《王彬继室夫人夏金虎墓志》¹¹，“太元十七年正月廿二亡”脱了“日”字，大女婿涑阳丁引的父亲丁宝官“永嘉太守”，“太守”二字为补刻。

数量：六朝墓志多为“一人一志”，仅《王兴之墓志》、《王兴之夫人宋和之墓志》与《宋乞暨夫人丁氏

1 故宫博物院、南京市博物馆：《新中国出土墓志·江苏》[贰]上册，第29页，文物出版社，2014年。

2 故宫博物院、南京市博物馆：《新中国出土墓志·江苏》[贰]上册，第33页，文物出版社，2014年。

3 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市郭家山东晋温氏家族墓》，原载《考古》2008年6期，转引自南京市博物馆：《南京考古资料汇编》叁，第1234页，凤凰出版社，2013年。

4 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发现一座陈墓》，原载《文物资料丛刊》第8期，1983年，转引自南京市博物馆：《南京考古资料汇编》叁，第1668页，凤凰出版社，2013年。

5 故宫博物院、南京市博物馆：《新中国出土墓志·江苏》[贰]上册，第5页，文物出版社，2014年。

6 故宫博物院、南京市博物馆：《新中国出土墓志·江苏》[贰]上册，第8页，文物出版社，2014年。

7 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南京人台山东晋兴之夫妇墓发掘报告》，原载《文物》1965年6期，转引自南京市博物馆：《南京考古资料汇编》贰，第1090页，凤凰出版社，2013年。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吕家山东晋李氏家族墓》，原载《文物》2000年7期，转引自南京市博物馆：《南京考古资料汇编》贰，第1153页，凤凰出版社，2013年。

8 故宫博物院、南京市博物馆：《新中国出土墓志·江苏》[贰]上册，第14页，文物出版社，2014年。

9 故宫博物院、南京市博物馆：《新中国出土墓志·江苏》[贰]上册，第10页，文物出版社，2014年。

10 南京市博物馆：《江苏南京仙鹤观东晋墓》，原载《文物》2001年3期，转引自南京市博物馆：《南京考古资料汇编》贰，第1125页，凤凰出版社，2013年。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吕家山东晋李氏家族墓》，原载《文物》2000年7期，转引自南京市博物馆：《南京考古资料汇编》贰，第1157页，凤凰出版社，2013年。

11 故宫博物院、南京市博物馆：《新中国出土墓志·江苏》[贰]上册，第22页，文物出版社，2014年。

合葬墓志》¹，为夫妇二人合用一方墓志。王兴之与夫人宋和之的志文分别撰写并各刻于墓志一面，宋乞与其妻丁氏的志文合写成一篇，刻于墓志的一面。在六朝墓志中夫妇合葬用一方墓志，即“二人一志”的情况并不多见，即使是迁葬并穴的东晋王建之夫妇墓出土的墓志²，和萧梁桂阳王萧融和王妃王纂韶合葬墓出土的墓志³，都是“一人一志”。

“一人二志”也不多见，《王建之夫人刘媚子墓志》有砖、石墓志各一方。根据发掘简报，王建之与妻刘媚之合葬墓出土3方墓志，2方石质，1方砖质，石质墓志均出土于墓室内死者头部，砖质的出土于高出封门墙顶部约3米的墓坑填土中。⁴刘氏石志171字，砖志144字，内容基本相同，石志增加了刘氏之祖“修武令刘义”及亡故大女、二女名字、还都陪葬的纪日干支。从石志在墓葬中的位置及王建之的墓志之中“夫人南阳涅阳刘氏，先建之半年薨，咸安二年（372）三月甲午朔十四日丁未迁神，其年四月癸亥朔廿六日戊子合葬旧墓”的文字，推测砖志是刘氏先葬时的“标识”，石志是合葬时用的正式墓志。这种“一人二志”在东晋墓志首次出现，应当引起关注。

《李墓墓志》出土时为两块，据发掘简报，在墓中两块相扣合，志文朝内。其上一块刻二“晋”字；其下一块刻志文3行，满行8字，共17字；志的侧面另有志文1行，11字。⁵这种形制的墓志也是首次发现，或许是唐宋以后墓志一合的滥觞。

六朝墓志一般集中写于正面，排列整齐，疏朗有序。也有正反两面都写志文的情况，如东晋《王闳之墓志》⁶、《王建之墓志》，反面文字接续正面，正反合为一篇志文。还有在砖侧撰写文字的，如《李缉墓志》等，将墓主人的卒葬时间写在侧面，位置较正面志文偏下。东晋《谢球墓志》的侧面满刻“晋故辅国参军豫州谢球安厝丹扬郡牛头山”18字，既像志文的关键词，又似后来墓志的“首题”，因是孤例，尚存疑。

“一志多块”是六朝墓志中较为特殊现象。《谢琬墓志》志文分别撰写在6块砖志上，内容连贯，文字之多，家族谱系之全，较为罕见。这些墓志分别放在墓葬棺床前和左右两侧，每处各2块。⁷将681字的长篇墓志完整的在6块墓志上布局书写，一气呵成，体现出惊人的设计制作能力。

“一墓多志”也是六朝墓志的一种现象。《宋乞墓志》、《宋乞夫人丁氏墓志》⁸、《宋乞暨夫人丁氏合葬墓志》墓主人宋乞卒于东晋，刘宋迁葬与夫人合为一墓。3方墓志不仅形制相同，而且志文同记一事，文字大致相同，却有112字、109字和127字之分。仔细阅读，一方为亡于晋太元（376～396）中的宋乞迁葬于元嘉二年（425）

1 故宫博物院、南京市博物馆：《新中国出土墓志·江苏》[贰]上册，第31页，文物出版社，2014年。

2 南京市博物馆：《南京象山8号、9号、10号墓发掘简报》，原载《文物》2000年7期，转引自南京市博物馆：《南京考古资料汇编》贰，第1202页，凤凰出版社，2013年。

3 南京市博物馆：《南京梁桂阳王萧融夫妇合葬墓》，原载《文物》1981年12期，转引自南京市博物馆：《南京考古资料汇编》贰，第1585页，凤凰出版社，2013年。

4 南京市博物馆：《南京象山8号、9号、10号墓发掘简报》，原载《文物》2000年7期，转引自南京市博物馆：《南京考古资料汇编》贰，第1211页，凤凰出版社，2013年。

5 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吕家山东晋李氏家族墓》，原载《文物》2000年7期，转引自南京市博物馆：《南京考古资料汇编》贰，第1158页，凤凰出版社，2013年。

6 故宫博物院、南京市博物馆：《新中国出土墓志·江苏》[贰]上册，第11页，文物出版社，2014年。

7 南京市博物馆、雨花区文化局：《南京南郊六朝谢琬墓》，原载《文物》1998年5期，转引自南京市博物馆：《南京考古资料汇编》贰，第1485页，凤凰出版社，2013年。

8 故宫博物院、南京市博物馆：《新中国出土墓志·江苏》[贰]上册，第30页，文物出版社，2014年。

的墓志，一方为葬于元嘉二年（425）的宋乞夫人丁氏的墓志，还有一方为宋乞暨夫人丁氏合葬于元嘉二年（425）的墓志。3方志文均有“元嘉二年（425）太岁乙丑八月十三日于江宁石泉里”的文字，将宋乞夫人下葬时，宋乞异地迁此合葬事宜书写清楚，埋入墓中。由于该墓未由考古人员正式发掘，墓志的位置不详¹。类似的“一墓多志”现象还见于安徽马鞍山东晋《孟府君墓志》²，和镇江谏壁《刘庚之墓志》、《刘硕之妻徐氏墓志》³，这种现象应与当时丧葬制度及葬俗有关系，值得研究。

表3 六朝墓志形制举例表

形制	举例
一人一志	《谢鲲墓志》、《高崧墓志》、《明昙懋墓志铭》、《萧融墓志》、《王纂韶墓志铭》
二人一志	《王兴之墓志》、《王兴之夫人宋和之墓志》《宋乞暨夫人丁氏合葬墓志》
一人二志	《王建之夫人刘媚子(砖)志》、《王建之夫人刘媚子(石)志》
一墓多志	《宋乞墓志》、《宋乞夫人丁氏墓志》、《宋乞暨夫人丁氏合葬墓志》
一志二面	《王建之墓志》、《王闵之墓志》
一志多块	《谢琬墓志》

南京市博物馆藏六朝墓志形制上总的说来是“一人一志”、“一志一面”，同时并存“一人二志”、“一志二面”，还出现了夫妇合用墓志的“二人一志”、内容连贯的“一志多块”和内容相同的“一墓多志”的现象，说明墓志形制在不断更新完善，直至南朝石质墓志铭的出现，墓志的形制最终确定，并成为隋唐后墓志铭形制的标准。

三 六朝墓志的文体

墓志的志文无论篇章长短都是按照一定的格式写就，为撰志者共同遵守。

《明昙懋墓志铭》属于墓志铭基本定型后较为典型的文体，有承上启下的作用。该墓志分为三个部分，一是“首题”，二是“志文”，三是“铭辞”。

“首题”中包含四个要素为：时代+官职+墓主人姓氏+墓志铭，这一结构成为后代墓志铭“首题”的标准。

“志文”包括墓主人生平和家族世系宗支。生平叙述详细，既述外貌、性格，又叙读书、做官，用叙事手法概括出墓主人的形象。世系宗支分为祖父母、父母、叔伯及夫人、兄弟及夫人，每个人的世系、官职都十分清楚，刘氏与清河崔氏的姻亲都有记述，笔墨侧重在门第、身份上。值得注意的是生平中有“载叶连芳，懋兹鸿德”、“天情凝澈、风韵标秀”、“兰釭已芜、青松无极”等句子，词句工丽，富有韵律。遣词造句善用比喻，字里行间融入了情感，开始富有文学意境，出现了散文化的倾向。这一时期墓志文体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1 南京市博物馆：《江苏南京市中华门外铁心桥出土南朝刘宋墓志》，原载《考古》1998年8期，转引自南京市博物馆：《南京考古资料汇编》贰，第1493页，凤凰出版社，2013年。

2 安徽省文物工作队：《安徽马鞍山东晋墓清理》，《考古》1980年6期。

3 镇江博物馆：《江苏镇江谏壁砖瓦厂东晋墓》，《考古》1988年7期。

引起了墓志铭“质”的飞跃。

“铭辞”系颂扬明氏政绩德行,光耀后人。四言韵句,句式整齐;用有骈偶,叙之虚清;辞藻华丽,声律匀齐。“铭辞”已经成为墓志铭中重要的部分,此时东晋墓志古拙朴实的文风已不复存在。

该墓志铭中一是“首题”使用“墓志铭”3字,单独起行,成为墓志铭一种新格式。二是祖、父、伯、叔、兄弟书写均另起一行,其父、伯、叔、二兄的夫人也在文中另起一行,长、三、四兄夫人则在行中空一格,以示尊敬,这种格式对后世墓志铭有很大影响。三是在生平叙述后用了“其辞曰”3字,这是转接到下一节“铭辞”的过渡语言,也成为后世墓志铭中规范的格式。

从对《明昙暕墓志铭》的分析中看到,墓志文体的“前志后铭”已经定型,这是一种新的专用的悼念性墓志铭形式,是从“墓志”到“墓志铭”的革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比《明昙暕墓志铭》出现更早“首题”格式的是刘宋永初二年(421)的《谢琬墓志》,志文开头的“宋故海陵太守散骑常侍谢府君之墓志”,单独起行,与志文分开。该志内容没有“前志后铭”,承袭了东晋志文的文体,也没有用韵的四言和华丽的辞藻。或许谢琬墓志的“首题”是墓志向墓志铭转变的开端,这是一篇转型期墓志的重要实物例证。

《萧融墓志铭》的“首题”为“□□□墓志铭序”,“首题”中有一“序”字,是迄今南朝墓志铭“首题”的孤例。它与隋唐墓志铭“首题”中的“墓志铭并序”之间应当有内在关系,为唐宋墓志铭格式的规范提供了依据。该志中“梁故散骑常侍抚军大将军桂阳融谥简王墓志铭”一句放在志文中间,即个人生平之末简短的谥词之后,仅空二格,不另起行,不同于其他墓志铭,也是孤例。

墓志铭中有撰文、书写者的姓名及官职是萧梁以后出现的,这在刘宋的《谢琬墓志》、《明昙暕墓志铭》中并未见到。《萧融墓志铭》志文“梁故散骑常侍抚军大将军桂阳融谥简王墓志铭”后,有“常兼尚书吏部郎中臣任昉奉敕撰”;《王纂韶墓志铭》¹“首题”后有“吏部尚书领国子祭酒王暕造”;《萧子恪墓志》²“首题”后有“五兵尚书南昌县开国侯琅琊王规、仁威将军晋陵太守陈郡谢举制铭”;《南朝陈故司空义阳郡公黄君(法)墓志铭》³首题后有“左民尚书江总制、太子率更令□大著作东宫舍人顾野王撰、冠军长史谢众书”。说明制作墓志铭的人作为墓志铭文体的一部分需写入文中,制铭者身份或为文人,或为官吏,为逝者制铭或逝者后人找有身份的人乞铭之风已经开始。

四 六朝墓志的书体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汉字由隶而楷的重要转变时期,楷书的成熟与广泛使用,取代了隶书作为“国书”的通行书体的地位。楷书历经千年发展,至今仍作为正书使用。六朝墓志清晰地展现了从隶书到楷书的轨迹,因此,六朝墓志的书体一直是学界研究的重要课题。

1 故宫博物院、南京市博物馆:《新中国出土墓志·江苏》[贰]上册,第34页,文物出版社,2014年。

2 故宫博物院、南京市博物馆:《新中国出土墓志·江苏》[贰]上册,第36页,文物出版社,2014年。

3 故宫博物院、南京市博物馆:《新中国出土墓志·江苏》[贰]上册,第37页,文物出版社,2014年。

1964年至1965年南京市博物馆在南京戚家山和象山发掘了谢鲲和王兴之墓,各出土了一方墓志,轰动全国。郭沫若先生对墓志和墓主人考证后,发表了《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的文章,提出两篇墓志的字体和《兰亭集序》的字体大不相同,传世的王羲之《兰亭集序》系他人的依托之作的观点,这在文化界引起了轩然大波。以高二适、章士钊先生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撰文驳议,认为王羲之所作《兰亭集序》是不可更易的铁案,非伪制作。兰亭真伪之辩在全国展开。

六朝墓志既有隶书又有楷书,以《王兴之墓志》为代表的兼有隶、楷风格的一种特殊的书体是引发“兰亭论辩”的导火索。这种隶书向楷书过渡时期的书体以墓志的形式得以保存并展露于世,对于研究书体转变是极为重要的资料。20世纪80年代初,《萧融墓志铭》和《王纂韶墓志铭》的出土,其成熟的楷书再次受到关注,推动了汉字演变及书法理论的深入研讨。

东晋墓志有隶书,有兼有隶、楷风格的,但未见楷书。《谢鲲墓志》为隶书,字体扁方,笔划舒展,波磔分明,是标准的汉隶。这一时期以隶书书写墓志的还有苏州吴县张陵山《张镇墓志》¹和《晋恭皇帝墓碣》²。以《王兴之墓志》为代表的一批东晋墓志,书体方正,结构谨严,多用方笔,起、落、转、折、收,笔笔平整有度,撇、捺的波磔不再刻意而为,字体仍有隶书遗意,是一种隶楷相容非隶非楷的书体,也是东晋墓志书体的主流。

南朝墓志楷书已经成熟,从《明昙暕墓志铭》字体看,汉字的点、横、竖、撇、捺、提(挑)、折、钩楷书的“八法”完全具备,在书写时,“横”、“竖”、“撇”的起笔以及“横”的收笔多作顿笔,“撇”能提笔出锋,“捺”先顿再提笔出锋,笔画转折之处有顿笔,楷书的书写方法充分展现。虽东晋隶楷兼容字体的风格在该墓志上依稀可见,但这时期隶书向楷书转变的过程已经完成。

纵观六朝墓志的书体,可以说东晋的兼隶兼楷的汉字虽留有“八分隶”的笔法,却有了“侧”(点)、“掠”(长撇)、“啄”(短撇)、“提”(直钩)等笔画³,从汉隶中脱胎出来。然而,这种曾经是墓志书体主流的兼隶兼楷的字体流行的时间并不长,进入南朝后很快就被楷书替代了。这一过渡时期的产物能在墓志里留下踪迹,弥足珍贵。南朝石志,如果说《明昙暕墓志铭》的楷书尚存隶书遗意,那么《王纂韶墓志铭》、《黄法墓志铭》的楷书与当今的楷体已无差异,楷书作为墓志铭的书体已经确定、畅行。就墓志铭书体演变过程而言,东晋至南朝的前面100多年间汉字从隶书中走出来,后面近100年汉字从非隶非楷中走出来,汉字完成了转变,墓志见证了中国文字由隶而楷的演变过程。

综上所述,东晋至南朝期间南方贵族墓葬的墓志内容从简单至基本完整,词句从朴实到华丽,文体从“刻砖(石)为识”到“前志后铭”,书体由隶书到楷书。最终确定了墓志铭完整形制,为唐宋以后墓志铭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墓志铭作为一种特有文体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作者单位:南京市博物馆]

1 南京博物院:《江苏吴县张陵山张氏墓群发掘简报》,《南方文物》2005年第4期。

2 故宫博物院、南京市博物馆:《新中国出土墓志·江苏》[贰]上册,第28页,文物出版社,2014年。

3 楷书—搜狗百科(<http://baike.sogou.com/v168756.htm>)。